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1.006

《金瓶梅》的地域性实证问题

张 同 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00)

摘 要:明代的运河码头城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金瓶梅》中的清河,并不是山东的清河,而是更多有着淮安清河的影子。《金瓶梅》中的清河所指与山东的运河码头临清相混淆。徽商和清河等的书写,皆展现了运河文化的流动性。从文化流动性的维度,解读《金瓶梅》与京杭大运河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能坐实《金瓶梅》故事中的地理位置、地名;也不能以为故事委实是发生在山东进而通过山东方言尤其是临清方言来印证或考索小说作者的籍贯。《金瓶梅》叙事的地域性实证研究往往忽视了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而导致缘木求鱼。大运河的交通,促成人口、物质、文化等的流动,而正是这种流动性生成了包括明清小说在内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解构了小说叙事实证研究的地域性。

关键词:《金瓶梅》;徽商;临清;清河;运河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1-0040-07

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可谓是明代市井文化的博物馆,其间物质文化、经济文化、官商文化、人情文化等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前贤时俊对《金瓶梅》叙事中的市井文化多有所探讨,对市井文化与京杭大运河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关注,然而,由于大运河的交通而造成的人口流动及其文化迁徙却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致造成误将《金瓶梅》文本作为历史史料进行语言学尤其是方言或以方言推测作者的相关探讨,而这些探讨似乎是在错误方向上的努力,故本文尝试着从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角度解读《金瓶梅》的地域性实证研究出现的盲区。

一、西门庆:鲁商,还是徽商?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州县有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将空其国矣。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1]289} 京杭大运河的沿河城市之一,山东临清“明末鼎盛期人口的九成都是安徽籍商人”^{[2]101}。谢肇淛所记录的这一则文献,具有颠覆常识的价值。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临清人当然都是山东人,忽视甚至无视了大运河文化所具有的流动性。殊不知,明代

临清人口十之九竟然是“徽商占籍”。安徽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文化具有地域性,与山东人不尽相同。临清为运河码头,其文化具有五湖四海性。但是,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从而《金瓶梅》以清河为故事的发生地,其间的叙述如果小说是写实的话就自然带有江淮文化的印记,这就造成了专家学者从山东尤其是临清的方言、饮食、风物等维度对这部小说的考察就无异于空中楼阁、缘木求鱼。因为临清的都市文化恐怕主要是以江淮文化为主,毕竟临清“十人九淮”。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民谚云:“无徽不成商。”又云:“无徽不成镇。”此处的“徽”指的是安徽人尤其是安徽商人。晚明的小说、笔记等皆可以作为野史或别史补证上述历史事实,例如在《儒林外史》第23回中,万雪斋是徽州盐商,先带小货,后弄窝子,时来运转,发了大财。此等书写虽是小说家言,但却真实地记录了徽商把持着淮盐的历史。

“淮安是淮盐转运的一大枢纽,盐的转运以商运为主。明初两淮运司设有两个批验盐引所,

收稿日期:2023-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机制研究”(20XZW003)

作者简介:张同胜(1973—),男,山东昌乐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个在仪真,另一个在淮安。”^{[3]127} 淮盐的转运既然以商运为主,西门庆走后门搞盐引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况且,“在淮盐商中以徽商、晋商为主”^{[3]127},结合着临清“十人九淮”的事实,可推知西门庆明为山东人,小说并没有说西门庆是山东人,仅仅说他是清河县的商人,从而极有可能是在清河经商的安徽商人。

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且仅仅是一个较为富裕的暴发户而已。《金瓶梅词话》第7回写道: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4]23}。破落户,指的是“无赖”“游荡无赖的败落人家子弟”之义,绝非“从原来的名门望族败落下来的人家及其子弟”。否则,名门望族从何谈起?他生活奢侈,出手阔绰,饶是如此,仍然不能与大徽商相比,更不能与盐商相比。明代万历年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至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大盐商,其生活奢靡不逊于贵族世家,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徽商具有地域性,还可以细分,不同地方的徽商经营不同的商品。假如西门庆是徽商,从其业务来看,他不会不是休宁人,因为他不从事典当业;他也不会是婺源人,因为他不卖茶叶;他也不会是绩溪人,因为他不开饭馆;他也不会是祁门人,祁门人主要经营布匹、木材,如果西门庆是祁门人,他不会不兼卖木材;他极有可能是黟县人,因为西门庆以卖绸缎、布匹为主,《金瓶梅词话》第69回说西门庆“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而安徽黟县人以经营买卖绸缎和布匹为主。

二、清河:山东的,还是淮安的?抑或在第三空间?

关于《金瓶梅》故事的叙事背景,前贤时俊迄今已经做过较多探讨。陈诏认为,它既不在山东“清河县,也不在阳谷县”^[5]。李巨澜、李德楠认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籍贯虽无定论,但为运河流域人是不争事实;作品所写的清河是运河商埠,西门庆商业活动以运河流域为背景也无争议。”^{[3]99}此论极是。

山东有一个清河,而淮安也有一个清河。结合着《金瓶梅》文本来,其间的叙述更符合淮安的清河。淮安市至今仍有清河区。小说本虚构也,历史在后结构主义者眼里其实也不过是叙事,更何况《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为“集撰”^[6],因此史

学考证之于小说的研究,作为前提就存在着合法性问题。然而,如果从模糊诗学和文化流动性来看,《金瓶梅》的清河究竟更接近于哪一个地方仍然值得探析。

(一) 黄梅雨季

《金瓶梅词话》叙述中有较多的淮安因素。例如第57回,潘金莲骂道:“没廉耻弄虚脾的臭娼根,偏你会养儿子哩!也不曾经过三个黄梅四个夏至,又不曾长成十五六岁,出幼过关、上学堂读书,还是水的泡,与阎罗王合养在这里的,怎见的就做官?就封赠那老夫人?”^{[4]716}此处的“三个黄梅”指的是三个黄梅雨季。山东清河地区何曾有过黄梅雨季?既然没有,那么,它指的就是淮安的雨季。小说文本叙事中经常出现“南风”如何如何,西门庆骂川广商人作“贼蛮奴才”,从而可知西门庆显然不是南方的商贩,进而表明小说的编纂者不可能是南方人。《金瓶梅》行文之间,也可以看出,小说作者对北方也有偏见,如“北人”如何如何寒伧。那么,这是不是就表明这部小说成书于既非南方亦非北方的中间地带,具体地说就是江淮地区?

(二) 盐引

明清两代,主要的盐种有10种,其中淮盐第一,占30%;浙盐第二,占20%。两淮盐场,靠近长江和京杭大运河,水路运输极为便利。扬州是靠近两淮盐场的中心城市。“天下之盐利,莫大于两淮,而浙江次之,山东、长芦则其下者也。故其价,两淮最高浙江稍次之,山东、长芦最下。所以然者,何也?两淮当江河之衢,四通八达,水运甚易,浙江则稍僻远,而山东、长芦又深入东偏,陆路数百里,水路千里之远。故商人报中,只于两淮,而浙江差少,长芦全无。”^{[7]849}从《金瓶梅》的叙述可知,西门庆从扬州提前支取盐引,在淮安的清河要比在山东的清河更合乎情理。此又可以证明《金瓶梅》中的清河当为淮安之清河更合乎情理也。

盐引之“引”,是一个计量单位,每引20斤。明中叶之前,为了支边,朝廷实行以粮食换盐引的政策。《金瓶梅》关于西门庆托蔡御史提前支取盐引的叙述,似乎不符合嘉靖之后的历史事实,因为明弘治年间,叶淇对盐引制度进行了改革,改为“输银于运司”,不再捐粮食给边防来换取盐引。如果小说叙述的是编纂者所生活的时代,那么就不会提及西门庆、乔大户以粮食支边所得的盐引。

如此一来,就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金瓶梅》实乃集撰之前的盐引书写,或所叙述的是盐引改革之前的事情。

“叶淇改革之后,徽商在扬州很快兴起了,从明弘治到万历年间,有很多徽州人来到扬州,经营盐业。”^{[8]67}《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它关于以粮食换盐引的叙事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然而却体现了徽商把持盐业的历史真实。西门庆如前所述身上被打上了徽商的烙印,那么,他走蔡御史的后门提前支取盐引,显然就是移花接木,并非实录。

(三)河下

《金瓶梅词话》第34回写道:“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因在河下管芦苇场,赚了几两银子,新买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拿皇木盖房。”^{[4]402}西门庆对应伯爵说的这番话,里面的信息量很大。其中的“河下”一词就暴露了《金瓶梅》清河叙事的马脚。山东与淮安都有一个地方叫清河。然而,山东的清河没有河下,而淮安的清河则有河下。

明代河下镇与清江、板闸并称为山阳县三大镇,而山阳即淮安。明中叶,朝廷实施“开中法”,“盐策富商咸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9]23}河下是淮盐转运的枢纽,两淮盐运司设有两个批验盐引所,淮安批验所是其中之一。如此一来,淮安河下地区就成为盐商聚集之地,也是富贵温柔之乡。

淮安的河下位于淮安西北的古运河畔,明清时期大批徽州盐商聚居在这儿。他们贩卖南北的货物,如湖州丝线、湖州缎子、无锡米、二十大车杭州货物等。河下,号称“小扬州”,甲第连云,冠盖阗咽。

(四)钞关

明代先后设置了十余所钞关,其间复有罢撤复设之变化,但临清、淮安、扬州、杭州、浒墅、河西务、九江七所钞关的设置一直保持到明末。《金瓶梅》写道,西门庆打点了钞关钱老爷,省下了大笔税款。山东清河由于地处内陆不靠河,因而没有钞关。山东清河附近的钞关设立在临清码头。临清钞关是明代七大钞关之一,据《大明会典》卷35记载,万历初年,临清钞关收税八万余两,名列各钞关之首。

《金瓶梅》叙事中的钞关表明,此清河非山东清河也。淮安,有一个清河马头镇,此处的“马头”是不是“码头”之讹?从山阳城南到清河马头

镇,酒馆林立,饭庄比邻,极为繁荣。由此可知,小说中的钞关书写与淮安的清河叙事更相契合。如果作整体观照,这一点更是明显。

(五)盐场

《金瓶梅词话》第48回,西门庆与乔大户高阳关上纳的三万粮仓钞,旧派淮盐三万引。蔡状元点了两淮巡盐,西门庆正好找他在扬州支取盐引。第49回,蔡御史满口答应,说:“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4]584}山东商人以粮支边,盐引为何要到扬州支取?如果小说的清河就在淮安,那么西门庆去扬州支取盐引,就合情合理。这岂不又证明了此清河乃淮安之清河?

(六)淮洪

《金瓶梅词话》中形容一个人能言善辩,就说她说话就像是“淮洪似的”:在第11回中,孙雪娥道:“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4]115}不言而喻,淮洪具有地域性,山东人不会将一个人的滔滔不绝比作口若淮洪,而淮安地区的人却会依据亲身经验这样说。第2回,西门庆问王婆:“你儿子王潮,跟谁出去了?”王婆说他“跟了一个淮上客人,至今不归”^{[4]24-25},那为什么王潮跟着“淮上”客人做行商生意呢?淮上即淮安。淮安府城,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之地,是治河、漕运、盐务、榷关重地。临清也是大运河城市,设若西门庆、王婆为山东清河人,王婆自然会说她儿子跟着北方最大的商埠城市临清的商人做生意;否则,何必逃离家门口的繁华商埠而跑到淮安呢?王婆既然说王潮跟着淮上商人外出经商,这就表明《金瓶梅》中的清河地处淮安更符合叙事逻辑。

(七)淮剧

《金瓶梅词话》第21回写道:“刚才他若撇了不来,休说你哭瞎了你眼,唱门词儿,到明日……”宋德慈、王毅对其中的“门词儿”注释为“门叹词”“门头词子”“门弹词”,“乃是淮剧的最初演唱形式”^[10]。试想,山东人会说淮剧之“唱门词儿”吗?不会,因为地方小戏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老百姓从小浸染的是地方戏,因而这种言说展现的就是民俗的习惯。

如果勉强以文史互证来看,《金瓶梅》中的清河县指的是南清河县,即今淮安一带。据《寰宇通志》,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始置,本泗州清河口地,治所在今江苏淮阴西南。元代改为清河县。因为河决城毁,治所屡有变迁。明代的时候,清河

县治所在淮安府,属于北直隶广平府。清乾隆时移治清江浦,即今淮阴市。张本忠认为:“《金瓶梅词话》运用最多的方言是淮阴方言。”^[11]淮阴方言似乎也可以证明《金瓶梅》中的清河就是地处淮安。

第三空间,是爱德华·索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在索亚看来,第一空间指的是真实的地方;第二空间指的是想象的地方;第三空间是融构了真实与想象的空间。《金瓶梅》中的清河,难以在地理中坐实。而据小说文本的叙述,由以上可知,它与其说是山东的清河,不如说是更接近于淮安的清河。但是,又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中的清河,以山东临清为原型。那么,山东临清与淮安清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三、小说叙事背景究竟是清河还是临清,抑或是一个虚构的运河城市?

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金瓶梅》所书写的清河,与其说是山东的,不如说是淮安的。但是,有学人认为小说明着写的是清河,实际上是山东临清。那么,如何认知和区分《金瓶梅》中的清河与临清呢?涩斋认为:“《金瓶梅》一书中的中心地方是清河,但从该书中所描写的看来,决不能认为作者所暗示的也是清河。清河不过是一小县,那里能那样繁华?那里能有南瓦北瓦?那里能有教坊?一个小县,有多少官员,那里能养得起玉皇庙那样的大庙?凡此种种,皆可以证明书中所谓清河一定另有所指,大概不是南京即是北京。”^[12]¹³¹此乃《金瓶梅》叙事背景为北京说法的论证。王汝梅也认为:“《金瓶梅》故事是以运河沿岸临清等商业都会为地理背景,又概括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场景。作者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沿岸,设置在儒家文化发祥地区。”^[13]²⁵⁶《金瓶梅》创作的地理背景,除去上述“北京说”,还有“临清说”“徐州说”“淮安说”“扬州说”“绍兴说”等多种说法。

(一)临清

有许多学者经过考证,认为《金瓶梅》叙事中的清河,实际上是临清。马征说:“《金瓶梅》故事有一个开阔的地理背景,这个背景集运河沿岸城市风貌之大成,而临清则是这个背景的轴心。”^[14]¹⁴¹薛洪勑认为,《金瓶梅》中的清河县,有学者论证就是明代山东临清州^[15]¹⁴⁸。王汝梅对临清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临清地区的砖厂、钞

关、晏公庙等遗迹是淮安、徐州、扬州等地所没有的。此其一。其次,《金瓶梅》叙述中的清河,实际上是临清,如清河从未建过皇家砖厂,而临清的砖厂则在历史上赫赫有名^[13]²⁵⁴。徐朔方说得更辩证一些,他指出:“《金瓶梅》以清河县为它的地理背景,它在当时最繁荣的内河港口临清的影响下,为商人而兼官僚地主的西门庆提供活动舞台,而它的方位却在黄河以南,离开临清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大大超过实际指的七十里。真实的清河县—临清—梁山泊附近的某地,阳谷的邻县,三者合一才是小说中的清河县,强调三者之一,而忽视其他两者,都不能正确地理解《金瓶梅》的地理背景。”^[16]

以上关于《金瓶梅》地理背景的种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其龃龉不合的地方,原因就在于,除了《金瓶梅》的创作性质为“集撰”之外,还忽视甚至无视了运河城市的文化流动性特点。如果我们将《金瓶梅》看作是历史或地理文献进行考证,那么就陷入了胶柱鼓瑟的地步。

我们退一步说,《金瓶梅》叙述中的清河,所指即临清,这个临清与历史上的山东临清其实也不是一回事。地理中的临清又名清源,位于山东西北部,原是一个小县城,几乎不为人所知。到了元代,朝廷开凿了会通河,途经临清,从此之后,它由于京杭大运河而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城市。明代的朱棣发动靖难战争,攻下南京后迁都北京。大明王朝的首都,需要江南财富北运,于是朝廷重新疏浚京杭大运河,而临清由于地处大运河的重要位置而变得商贸繁荣,商人如鲫,熙熙攘攘,繁华无比。

临清,“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繁荣昌盛达500余年。陈继儒说:商人到江南贩布,“其溯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17]²¹。据清代乾隆朝《临清州志》卷11“市廛”可知,临清城里布店73家、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粮店百余家、瓷器店二十余家、纸店24家、辽东百货大店13家、典当铺百余家、客店大小数百家。

明后期,朝鲜使臣崔溥朝觐北京,途经临清,他在日记中写道:(临清)“在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18]¹³⁴嘉靖至万历年间,是临清商业最为繁荣的时期。万历时,临清作为南北中

转站,全国的货物荟萃于此。南来北往的商人活跃在临清市场,各行各业都十分兴盛。万历时期,临清所设钞关的税收“居全国八大钞关税额之首”^[19]¹¹⁸⁸。

黄仁宇认为,在明代漕运系统中,临清是大运河运输主干线上一个颇为重要的点,沟通了闸河河段和卫河河段:“临清的地位,是作为从漕河运来的货物向华北内陆各府县散发的运输中转站;这一点从货物接收地区的地方志中可以证实。”“到宣德时,临清成了全国33所大商业城市之一,明王朝并在此设置了钞关,既征商税,又收船料”;“万历时,每年包纳税银二万余两,相当于当时商税总数的三分之一。”^[20]¹⁸⁴ 总之,临清是明清时期我国北方最大的商埠之一。

在《水浒传》中,武大郎、潘金莲、武松等人的籍贯为清河县,但是武大郎为了避开清河县的流氓欺侮他,将家搬到了阳谷县,阳谷县于是就成为故事展开的空间。《金瓶梅》对此进行了改写,将这些人物的籍贯改为阳谷县,故事空间改为清河县。这是因为,《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是一商人,货物来自南北,正如韩南所言,小说作者的改动是为了迁就在《金瓶梅》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临清”这个繁华港口^[21]²²⁶。临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清河县在明代与东平府并不相属,但小说又让清河县隶属于东平府,并将临清放在一条线上,这是艺术杂拼、虚构的留痕。

《金瓶梅》的作者经常把清河、临清放置在一起,甚至彼此相混淆,这与临清在明中期成为大运河重要的交通孔道有关。临清,是大运河城市,它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农业文化的流动性文化,即商业都市文化。西门庆之所以能够成为暴发户,就在于他生活在临清这样的运河都市中,其文化环境有利于商贸。京杭大运河的流动性促成临清成为一个商品的集散地和南北文化的大熔炉。

(二)运河城市的代名词

《金瓶梅》中的清河、临清,并非现实生活中的清河县或临清码头。“《金瓶梅》所设定的故事发生地‘清河’,并非确指的地理城市,而仅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存在。”^[22]清河并非实指,而是一种都市类型,即大运河沿岸城市。陈诏认为:“如果真的以当时广平府清河县这样一个贫瘠落后的小县城作为写作背景,就很难拓展视野,达到如此的深度和广度。唯有借清河县之名,写运河沿线的繁荣城市之实,把西门庆一家的故事放在广阔

的社会背景中,才能上至朝廷,下及奴婢,烛照市井各类人物,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众生相,使作品具有典型意义。”^[5]陈诏对《金瓶梅》故事的地点之认知非常到位,其结论也很有道理:“《金瓶梅》作者对扬州、徐淮地区的了解远远超过清河和山东。”^[5]田秉锬认为,“要在运河流域的范畴内,理解《金瓶梅》的文化精神。”^[23]此诚为知言。也就是说,《金瓶梅》中的清河、临清都是运河城市,属于小说虚构的河流都市,不能将其坐实为历史上实体的城市;而理解《金瓶梅》的意义则不能脱离运河文化的流动性空谈。

《金瓶梅》称南方人为“南蛮子”,称北方人为“北人”;口音也是南腔北调;酒也是南方的、北方的都有……由此可知,《金瓶梅》叙事之地应为江淮之地。江淮之地是南船北马互换之地。《金瓶梅》的文化流动性,还表现在从小说叙述的文本来看,“《金瓶梅》中的饮食体现着南北交融的特点”^[24]。既然我国南方的、北方的饮食文化都汇集在运河城市,山东临清是其中之一,淮安清河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南北交汇的“这一个”的独特风味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金瓶梅》的叙事具有地域文化的流动性和杂合性,从而也表明从地域性入手考察这部小说的作者是立不住脚的。

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25]¹⁴。《金瓶梅》中的地名诸如清河、临清、阳谷、东京等都是虚构的,至少是东拼西凑集撰而成的,从而出现同一空间的所指不一的现象,如京城或指开封,或指北京。它们不是明代或宋代地理的实录,从而从地域性考索《金瓶梅》的作者、方言、民俗等就会误入歧途。

四、运河文化流动性对地域性知识的解构

张竹坡在《金瓶梅》第67回评点中首次提到了“山东声口”。张焘、黄人、郑振铎、吴晗、鲁迅、胡适、张远芬等都认为《金瓶梅词话》出在山东人之手,方言为山东土话。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原本缺少第53—57回,由一位陋儒补写,不仅“肤浅鄙俚,时作吴语”。陈蝶仙、魏子云、戴不凡、黄霖等认为,《金瓶梅词话》里有越语、吴语。张惠英认为,《金瓶梅》中有吴方言、杭州方言等,

表明作者应为南方人。马永胜、姚力芸在《〈金瓶梅词话〉方言新证》中认为,《金瓶梅》中有雁北方言土语即晋语。马征、鲁歌等也是晋语说的拥趸。张本忠、宋德慈、李锦山、高菁菁、王毅等研究了《金瓶梅》中的江淮方言,包括淮安方言、淮阴方言、泰州方言等。其实,《金瓶梅》中的方言不下十余种,可谓是南腔北调齐全,忽而南方方言,忽而北方方言,忽而江淮地区的方言,这一现象恰好也能够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为“集撰”,它体现了运河文化的流动性和丰富性。

或云《金瓶梅》中的清河即临清,而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从方言来看,姚吉刚《〈金瓶梅〉中的合肥方言研究》认为,“作为江淮方言重要分支的合肥方言在《金瓶梅》中大量存在,其中200多例合肥方言至今仍然被合肥方言区的人们频繁使用。从构词法、词类、语法功能、一词多义4个方面探讨了书中的合肥方言,对于丰富《金瓶梅》的方言研究尤其是江淮说具有较大意义”^[26]。

关于《金瓶梅》中的方言问题,我们认为从“山东方言”“吴语”“徐州方言”“扬淮方言”等方言的地域性来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在方法论上就存在着问题,因为一是明代山东地区的语言实则是移民的语言,山东在明初之所以需要移民就因为齐鲁大地上几不见人迹;二则是蒙元时期甚至还可以上溯至辽金时期民族语言经历了民族接触、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今天,从文化的流动性来看,上述观点依然成立,即大运河的便利交通促成了人口的流动,从而促生了地域文化之间的接触和融合,打破了地区间文化的隔离和封闭,生成了新的具有流动性的运河文化。在运河文化土壤中长成的《金瓶梅》,它就很自然地表现出文化的流动性、杂合性。

京杭大运河不仅仅是从北京到杭州的人工河的流淌,而且是社会文化、阶级结构、职业构成等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全方位流动。《金瓶梅词话》是京杭大运河文化的产物,处处充满了文化的流动性。历史上临清的商人,十之九乃安徽人。小说中的清河,实乃运河城市的典型写照,并非山东清河县的写实。如果刻意求实,它身上更多所留痕的倒是淮安的清河或江淮地区的运河城市。“以一斑而见全貌”,从临清的徽商和作为运河都市的清河可知,《金瓶梅词话》的实质就是一部以集撰形式成书的小说,它所展现的是运河城市商

业市井文化的通性真实而非历史真实,它所体现的是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而非凝固性,它所书写的是晚明时期的人情文化而非语言纪实,如果我们拘泥于小说文本字面的叙述而考察山东民俗、临清方言、清河风物等实在是无异于升山采珠。

参考文献:

- [1] 谢肇淛. 五杂俎[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2] 斯波义信. 中国都市史[M]. 布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3] 李巨澜, 李德楠. 运河与苏北城市发展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4]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陶慕宁, 校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5] 陈诏. 《金瓶梅》故事地点考[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3).
- [6] 张同胜, 杜贵晨. 论《金瓶梅》成书的“集撰”式创作性质[J]. 明清小说研究, 2008(1).
- [7] 陈仁锡. 皇明世法录[M]. 台北: 学生书局, 1965.
- [8] 赵焰. 徽商六讲[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
- [9] 王光伯, 程景韩. 淮安河下志[M]. 荀德麟, 等点校.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6.
- [10] 宋德慈, 王毅. 《金瓶梅》中江淮次方言臆礼[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3).
- [11] 张本忠. 《金瓶梅词话》与淮上方言[J]. 枣庄师专学报, 2001(1).
- [12] 涩斋. 《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M]//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3] 王汝梅.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
- [14] 马征. 《金瓶梅》之谜[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 [15] 薛洪勳. 也谈《金瓶梅》与临清[C]//《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 [16] 徐朔方. 《金瓶梅》的地理背景[J]. 文学遗产, 1991(2).
- [17] 陈继儒. 陈眉公全集[M].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禎刻本.
- [18] 葛振家, 崔溥. 《漂海录》评注[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2.
- [19] 安作璋. 中国运河文化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 [20] 黄仁宇. 明代的漕运[M]. 张皓, 张升,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21] 韩南. 韩南中国小说论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2] 王进驹, 杜治伟. 《金瓶梅》时空叙事的创新及其小说史意义[J]. 文艺理论研究, 2020(3).

[23] 田秉锷. 《金瓶梅》与运河文化[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4).

[24] 王平. 《金瓶梅》与运河文化论略[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0(2).

[25] 雷·韦勒克, 奥·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26] 姚吉刚. 《金瓶梅》中的合肥方言研究[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Empirical Problems of Locality of *The Golden Lotus*

ZHANG To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Linqing, a port city of the canal in the Ming Dynasty, most merchants are from Huizhou. Qinghe in *The Golden Lotus* isn't the one in Shandong, but refers to the one in Huai'an. Qinghe in *The Golden Lotus* is mixed with Linqing, a port city of the canal in Shandong. The writing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Qinghe, etc. demonstrates the mobility of the canal culture. If we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lden Lotus* and the culture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from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mobility, we can find that the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names in the stories of *The Golden Lotus* can't be confirmed, that the stories don't really happen in Shandong, and that we shouldn't then verify or explore the author's native place through Shandong dialect, especially Linqing dialect.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ocality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Golden Lotus* often neglects the mobility of the canal culture, which leads to no result. The canal's transportation facilitates the mobility of the population, material and culture, etc., which creates the canal culture, including the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mobility of the canal culture deconstructs the locality of the empirical study of novels' narrative.

Key words: *The Golden Lotus*; Huizhou merchants; Linqing; Qinghe; the canal culture

(责任编辑 陇 右)